



论克劳塞维茨的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

吴 琼

编者按：此文共分三个问题论述，本期先刊登第一个问题。另两个问题在下期刊登，题目是：二、综合的方法和“现实战争”的整体性质；三、从“绝对战争”到“现实战争”，再到“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是德国近代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1780—1831)在他的《战争论》中提出的著名学说，也是《战争论》的理论核心。对这个学说的内容、方法和目的究竟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至今，已成为国内外《战争论》研究中的一个争论最大的疑难问题。为了批判吸取“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中的重要思想，有益于我军军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开展，本文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个学说作一探讨。

一、“思想实验”的方法和“绝对战争”学说的提出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一开始就提出了“绝对战争”学说。人们对这个学说提出了种种责难，其实只要考察一下克劳塞维茨所用的方法，即“思想实验”的方法，就不难理解他之所以首先提出“绝对战争”学说，是为了沿着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途径，从理论上暂时撇开构成战争整体中的多种复杂要素，对其中“暴力”子系统的本质属性作单独的考察并得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所必需的。

“思想实验”是科学抽象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在经验(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严格的逻辑推理，把研究对象置于比较理想的纯粹状态下，简化复杂因素，忽略偶然因素，纯化主要因素，用理想化客体代替实在客体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在“思想实验”中，研究者通常以“理想模型”代替实在客体，高度发挥思维的能动性，首先抽象出研究对象某一方面的本质属性；然后再运用综合的方法，联系现实经验对这种研究成果加以“修正”，使其与客体逐步趋于一致，最后在思维中完整地复制事物各方面的本质属性。一般说来，“思想实验”中的合理结果虽然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产物，但其内容毕竟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反映和概括。如力学中的“理想刚体”、光学中的“绝对黑体”、化学中的“理想溶液”和生物学中的“模式细胞”等。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许多重大理论的突破和重要原理的发现，都同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有关。例如，伽利略关于惯性定律的斜面实验；牛顿关于物体在“无阻力”情况下运动的“极限运算”方法；海森堡提出的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爱因斯坦建立狭义相对论时提出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等等。它们都对自然界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预言，加快了人类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步伐。

克劳塞维茨生活在欧洲资本主义文明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是一位“造诣极高的军事问

题著作家”①（列宁语）。他青年时代在柏林军事学校受到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中、晚年很注意研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他在《战争论》中提出了使许多研究者感到相当奇特、捉摸不透的“绝对战争”学说，便是用的“思想实验”方法。我们按照《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什么是战争”）的自然顺序读下去，便能够发现他是怎样运用这个方法探讨战争在“无阻力”情况下的运动规律，从而提出“绝对战争”学说的；而又是怎样运用综合的方法，探讨战争在“有阻力”情况下的运动规律，从而提出“现实战争”学说的。

第一，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而简练地介绍了自己的方法论原则，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也就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但是研究这个问题时，比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部分时更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体”②）。

第二，他随后以战争的细胞形态“搏斗”为逻辑起点和理想模型，从中分析出构成战争整体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暴力手段”、“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③，从而，为揭示战争整体具有“暴力”、“社会政治”和“军事”三个子系统的结构，打开了理论大门。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战争中“暴力”子系统的本质属性作单独的考察之前，克劳塞维茨原已申明：战争中的“暴力”子系统、“社会政治”子系统和“军事”子系统是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整体，亦即战争中的“暴力”子系统事实上是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子系统和“军事”子系统而单独存在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战争暴力的残酷和破坏性、战争暴力的大小、运行速度和运行机制等，不但要受到“军事”子系统的限制④，而且要受到“社会政治”子系统的限制⑤。

第四，但是，为了抽象出“战争哲学”；即从战争中首先抽象出“暴力”子系统的本质属性，并获得一种关于战争“一般情况”的理性知识；克劳塞维茨必须从理论上暂时撇开与“暴力”有紧密联系的“军事”子系统和“社会政治”子系统中的诸要素，而把战争仅看作是抽象的互施“暴力”的敌对双方，以便做到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进行实验”⑥，亦即开始进行“思想实验”。

第五，这种“思想实验”的具体过程是：以“搏斗”为理想模型，通过“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⑦，设想由于在战争有一方不顾一切地使用暴力，而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按照严格的逻辑推理，在战争中便会出现三种“相互作用”和三种“极限”，从而产生一种暴力达到“最大限度的使用”、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在军事行动中无停顿和间歇、战争的运行呈现为一种机械必然性的“绝对战争”⑧。

第六，克劳塞维茨认为，“绝对战争”虽然以“搏斗”为理想模型，按照逻辑上必然的样式推论出来的；虽然是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出现的战争形态（似乎在“玩弄逻辑”或做“不可捉摸的概念游戏”⑨）；但又是战争在“无阻力”情况下运动必然会出现的战争形态。换言之，现实世界中的一切战争，如果不是遇到内部（“军事”子系统）和外部（“社会政治”子系统）的“阻力”，本来是完全能够、也完全应该达到这种战争形态的。因此，克劳塞维茨认为，“绝对战争”乃是战争所固有的本质属性、潜在着的本性或自然属性；“绝对战争”又可称为战争的“原始概念”⑩或“纯概念”⑪；他以后总是称“绝对战争”为“战争所绝对具有的本质”⑫、“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⑬或“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⑭、“哲学的，纯粹逻辑的倾向”⑮等等。

总之，由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开始便运用了本质上是“思想实验”的方法，才排除了多种复杂因素的干扰，把战争置于抽象的、绝对的、理想的或纯粹的状态下，提出战争在“无阻力”情况下运动只是一种“暴力”行为，并且具有“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等一系列本质属性或自然属性的“绝对战争”学说。他之所以提出“绝对战争”学说，是想在建构战争理论时首先确立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战争概念；然后，再逐步描述战争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深化运动。他所运用的“思想实验”方法，也是他在《战争论》全书使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战争现象异常复杂，构成战争矛盾整体的要素非常繁多，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把战争中某一方面的本质属性置于简化或纯化的条件下，是有助于发现问题并得出深刻结论的。克劳塞维茨用这种方法在军事科学史上首次揭露出战争的“暴力”本质和“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等本质属性，无论就战争的本体论还是就方法论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突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例如，仅从拿破仑战争时代以来，总的来说，暴烈性在战争发展过程中趋向“极限”的倾向（战争的暴力程度日益强大、军事目标日益坚决、时间和空间的间隔日益缩短、战争运行的必然性日益增多、战争事件的内部联系日益紧密等等）不是已被战争实践所证明了吗？关于现代战争的暴烈性问题不是越来越受到科学家和政治家们的重视，值得我们做多方面的思考吗？

诚然，对于克劳塞维茨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提出的“绝对战争”学说，在学术界长期存在着意见分歧。例如，苏联学者米尔施泰因便指责克劳塞维茨是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其理由是克劳塞维茨研究战争时没有从“具体现实”的感性战争出发，而仅从“绝对战争”的抽象概念出发，“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类似，他提出了绝对的，即脱离具体现实的理想的战争概念”^⑩等等。其实，这种指责是不能成立的。作为黑格尔的同时代人，克劳塞维茨不可能不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现有资料证明，克劳塞维茨在建构战争理论时只是着重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和辩证逻辑，并且尽可能地使之立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⑪。如果仅就克劳塞维茨建构战争理论时首先确立一个最抽象的“绝对战争”概念，于是便把他说成是个“唯心主义者”，那么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当军事科学真正进入理论思维的说明以后，是不应该从“具体现实”的感性战争出发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分析任何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时，决不能从“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出发，必须首先“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只有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才能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所以，马克思又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⑫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在建构战争理论时首先确立一个最抽象的“绝对战争”概念，是符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要求的。再者，他本人又不曾把“绝对战争”学说凝固化，更不曾把“绝对战争”说成是现实世界中一切战争的本源，怎么能够说他是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呢？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绝对战争”并不象某些研究所断言的那样，是所谓“单纯逻辑推演的产物”。克劳塞维茨明确地说过：“我们的思想并不是从抽象研究中得来的，而是从整个战争现象给我们的印象中得来的。”^⑬任何一种“思想实验”不仅需要运用抽象的逻辑思维，而且需要运用生动的形象思维，即需要具备同客观事物有关的经验条件；克劳塞维茨运

用“思想实验”方法提出的“绝对战争”学说，实际上是以他亲身经历的拿破仑战争为原型的。马克思在谈到“最一般的抽象”之来源时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相反的道路。那总是从后面，总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②因为拿破仑战争是克劳塞维茨所生活的欧洲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战争发展过程的最高级、最成熟的完成阶段，也是克劳塞维茨全部战争理论的逻辑终点（本文下面还要作具体论证），所以，正是在拿破仑战争这个战争“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容易揭示出战争最抽象的一般本质。况且，克劳塞维茨本人在《战争论》中已经提供大量的证据说明，他恰恰是从拿破仑战争中抽象出“绝对战争”概念的。例如，他说：

“在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中，战争的进行达到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力量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暴力的自然规律”^③；

“正是1805年的、1806年的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使我们容易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④

众所周知，恩格斯曾经用“军队众多性”、“军队本身的运动性”、“进攻工具的大量使用和这些进攻工具的运动性”^⑤等，来概括法国大革命以后拿破仑战争的形态特点；克劳塞维茨则是用“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军事行动中无停顿和间歇等，来概括拿破仑战争形态特点的。至于克劳塞维茨这样概括拿破仑战争的形态特点是否准确和得当，是否有些绝对化，那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但他确实是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拿破仑战争的上述形态特点，并且结合逻辑推理，再进而提出“绝对战争”概念的。由此可见，“绝对战争”学说并非单纯逻辑推演的产物，它在客观世界中是有原型的，本质上是对拿破仑战争形态的一种反映和概括。那种把“绝对战争”学说简单地归结为黑格尔哲学并否认“绝对战争”客观实在性的意见，是很值得商榷的。（待续）

（作者 海军政治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见《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②③④⑤《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下同，第23、24、25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二卷，第310页。

⑦⑧⑨《战争论》，第23、24、26、28页。

⑩⑪⑫⑬⑭⑮《战争论》，第50、28、855、46、44页。

⑯米尔施泰因：《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6页。在我国，鲍世修（敬恩）同志持有同类观点，请参见他的“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本质理论的进步意义及时代局限”（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5期）和“从绝对战争到现实战争”（载《哲学研究》1981年第11期）。

⑰参见吴琼：“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方法论问题”（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2期和第3期）。

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4、215页。

⑲《战争论》，第186页。

⑳同⑲，第218、219页，及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一卷，第58页。

㉑《战争论》，第236、362页。

㉒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见《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卷，第180—182页。